

的領導者均為副國級領導人。透過這種高規格配置，統領發改、財政、金融、商務、工信等部門共同參與。

中美兩國定期舉行高級別經濟對話，可追溯至2006年12月開創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首次對話由當時分管商務工作的中國副總理吳儀與美國財長保爾森主持。對話每年舉辦兩次，集中討論戰略層面的重大經濟議題。

2007年4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日本期間，與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啟動了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機制。當年12月，首次對話在北京舉行，由分管發改、建設、國土資源等工作副總理曾培炎同日本外務大臣高村正彥共同主持。

牽頭官員幾經調整

2008年3月，國務院換屆，吳儀、曾培炎卸任。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皆由新任副總理王岐山（分管商務、金融工作）接手。當年4月，首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首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由相繼在北京舉行，亦由王岐山出席。前者根據2007年12月《第十次中歐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確立；後者則是在2008年1月，由溫家寶和英國首相布朗達成的共識而建立。

中美方面，2009年4月，兩國領導人在倫敦G20金融高峰會期間，同意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與2005年啟動的“中美戰略對話”合併為新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加強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合作。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於2009年7月在華盛頓舉行。由於該會晤同時橫跨戰略、經濟兩大領域，故而中美均派雙代表參加。時任中國副總理王岐山、國務委員戴秉國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財政部長蓋特納共同主持。

整體來看，在2008年至2013年間，共有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中英經濟財金對話運作。中國方面均由副總理王岐山帶隊參與。

2013年3月全國“兩會”換屆後，4個涉外經貿對話再次進行分工。中美對話由分管商務的副總理汪洋負責；中歐、中英對話則由分管金融、工業、交通的副總理馬凱接棒。而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2010年舉行第

三次後，受釣魚島問題等因素影響，中日關係一度陷入僵局，對話機制長期停擺。

同時，中國積極拓展與歐洲經濟大國的關係，開拓增量。2013年4月法國總統歐蘭德訪問中國，兩國決定建立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2014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德期間，與德國總理梅克爾決定建立中德高級別財金對話機制。兩大對話亦由馬凱擔任牽頭人。

2017年4月，中美領導人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會晤期間決定，改革原有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新建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絡安全、社會和人文等4個高等級對話機制。隨後，當年7月，中國副總理汪洋與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商務部長羅斯共同主持了首次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減少分歧摩擦，維護多邊貿易

令人遺憾的是，隨着特朗普政府掀起貿易戰，中美經貿關係急轉直下，全面經濟對話也陷入停滯。2018年3月新一屆國務院就職後，分管金融、科技、工業的副總理劉鶴出任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也是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為解決貿易紛爭，劉鶴曾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舉行了十幾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以及二十多次牽頭人電話磋商。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遲遲未再舉行。

除了中美對話之外，中德對話、中歐對話也由劉鶴負責。而中法對話、中英對話則由分管商務的副總理胡春華領銜。至於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8年才得以重啟。2018年4月，第四次對話在東京舉行。中方牽頭人為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日方仍由外相擔任。這也是首次出現由非財經系統的官員來主持經濟對話。2019年5月又在北京舉行了第五次。

如今，隨着後疫情時代國際經貿往來的復甦，中法、中歐、中德對話相繼重啟。中美、中英、中日的對話機制則尚未恢復。雙邊財經對話，對於減少分歧摩擦、消除隔閡誤解，現實意義重大。中方積極推動財經對話，既是着眼於維護多邊貿易和經濟全球化，也是應對圍堵打壓的務實平衡之舉。 

掃碼閱讀原文

